

理论探索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为例

孙代尧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解释，不断形成重大的理论创新或突破。本文以19世纪40—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之演进为例，探讨他们是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作出理论创新的。

一、19世纪40—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的演变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策略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一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它；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且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1]（P307）。“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P530）这些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阵痛之中。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利润。在这半个世纪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对其作出精辟的剖析并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分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并必然采取暴力革命形式的论断。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普遍繁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或弹性，表明它还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发展，由此开始改变原来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短的看法。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P470）随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马克思后来在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3）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因出现了由自由放任向垄断发展的趋向而取得了新的适应性，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也得到了发展，到60年代，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重要作用。在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的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却异军突起。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

面对新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40年代形成的视暴力革命为惟一策略的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变。他们开始把暴力的、和平的两种方式并列地提出，并明确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1871年7月3日，即巴黎公社刚刚遭到镇压后不久，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说：“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4]（P683）1872年9月，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5]（P179）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当时是议会民主制最发达的国家。而在当时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中，行政的权力仍然高于议会的权力，比如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议会“仅仅作为点缀”，而实际上由军事—官僚机构统治，所以在这类国家（法、德、奥、俄等）中，无产阶级仍然应当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二、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的重要突破：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在世上又生活了12年。在恩格斯生命的这最后十余年中，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上，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繁荣。英国、法国这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德国也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到80年代，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跻身于现代化工业强国之列，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典范。由于经济的繁荣和进步，资本家的剥削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从靠压低工人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转为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并对工人作了部分让步，劳资冲突明显缓和。很显然，这一时期欧洲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形势。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日趋完善。英国经过第二次、第三次议会改革，大大扩大了普选权；法国第二帝国已经垮台，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都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在德国，由于建立了帝国国会，给无产阶级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推荐稿件

- 不平衡发展与中国新型城乡二元...
-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
- 马克思“改变世界”理想的公共...
- 我党提出“三个执政”的历史背...
- 在多元哲学景象中寻求确定性立场
- 提升信息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 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
-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马克...

相关稿件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76-1978年中国引进...
- 对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历史地位...
- 《江泽民文选》的社会和谐思想...
- 论社会的网络结构
-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党的...
- 论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的同一性
- 浅论“资本生产力”--兼评一...
- 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治理论的...

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无比的改进。特别是新使用的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城市建设也逐步现代化，各大城市新建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2]（P520）。由于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运用，军队的调动灵便而迅速。在这种形势下，当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军队时，任何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都是发疯、送死，让“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晚年恩格斯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作了重大改变。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大选中一举赢得35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的胜利，不仅导致俾斯麦政府下台和“非常法”被废除，也成为恩格斯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折点。他在3月7日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2月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因此，我们有责任使革命不致夭折。……所以，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6]（P359）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公开地详细阐述了党的策略观点。他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即合法斗争的策略。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都应当这样做，因为“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当然，这必须以统治者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否则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路”。至于到那时是否修筑街垒，诉诸武力，恩格斯作了否定的回答：“除非它失去理智……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2]（P403）

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2]（P411）。这时，恩格斯已经把变成了民主共和国的法国，与英美一起列入可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同年10月，恩格斯又首次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的胜利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恩格斯分析道：“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7]（P290-292）1893年6月德国大选前，恩格斯在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时说：“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7]（P629）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6月大选中获得超过1/4的选票（178.7万张）和44个议席后，恩格斯更加坚信了社会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这一判断。显然，恩格斯已经在考虑新世纪初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7]（P636）。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议会的多数，是否就能根据宪法顺利地成为执政党？恩格斯认为，关键在于：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赢得军队中大多数士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可以使统治阶级不敢停止宪法、发动武装进攻，或者即使发动军警来镇压，军警也会拒绝向人民开枪。在1893年6月对法国记者的那次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每6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7]（P629）一年多后，恩格斯讲了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古罗马曾有一个名为基督徒的颠覆派，由于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而备受罗马帝国的迫害和镇压；但是当这个团体经过17年的积蓄力量，使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时，君士坦丁大帝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2]（P525-526）。恩格斯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利用普选权，开展合法斗争，争取广大农业工人、军队中的士兵，最后迫使统治阶级再也不能采取暴力镇压政策，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2]（P521）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多数人的觉悟只能靠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达到。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指争取民主，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积聚力量，提高理论素养，准备未来的决战。

在革命的进程上，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巴黎革命都没有什么成果，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而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表明，夺取政权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2]（P513）。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剧变的过程，而是“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自然过程一样”，是一个平稳的和平的渐进的过程。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是制定革命策略的根据，前者改变了，后者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2]（P517-518）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却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即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2]（P524）

四、结论和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从早期只承认暴力革命，修正为可以用暴力的或和平的两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再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议会斗争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形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都是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所造成的不同事实出发得出的，顺应了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在这个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革命策略思想特别是恩格斯晚年的重大理论突破，对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这一改变，决不是像当年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和后来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晚年已“蜕变”成“修正主义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更不是“放弃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且恩格斯晚年在放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思想的同时，也没有矫枉过正，把和平过渡上升为普遍规律。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策略手段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夺取政权的方式，无论是合法的、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都不具有原则的意义，“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8]（P47-48）

恩格斯在《导言》中曾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实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P510）与恩格斯在世时相比，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特别是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9]（P80），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仍如当年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P51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仍然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英美法德等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但西欧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治力量通过走议会民主路线，现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很多国家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虽然它们只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资本主义作局部改良，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探索中，我们还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纠错和创新，一旦发现原来的设想在现实中证明不合适，走不通，能灵活机动，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果断地调整和改变策略，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切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取得成功的（江泽民语）；一切“躺着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是执政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导致亡党亡国（邓小平语）。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9]（P66）。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孙代尧（1964—），男，湖北仙桃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